第43卷 第4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43, No.4
2006年7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ul. 2006

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

朱汉民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长沙 410082)

摘 要: 周敦颐及其《易》学在北宋时地位并不高,但后来在宋学系统中却被尊为"道学宗主"。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朱熹等人的推崇,而是由于周敦颐从根本上抓住了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这一宋学的问题意识,将《四书》所倡儒家伦理建立在《周易》的宇宙哲学基础上,成功地使《周易》的太极阴阳、天地合德、吉凶之几、知性智慧转向《四书》的"圣人之本"、"孔颜乐处"、"善恶之几"、德性修养,重新建构了以内在德性为本的天人合一之道。

关键词: 周敦颐;《易》; 学; 宋学;《四书》
中图分类号: B2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6)04-0043-05

在复兴儒学的大背景下,群星灿烂的北宋时期,涌现了许许多多知名儒学学派与学者,诸如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在学术上具有创新精神的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他们均是开创宋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倡导的以义理解经的学术风气使得北宋学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并将中国古代经学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义理之学为特征的宋学阶段。

但是,宋学的研究领域一直存在一个疑问:北宋时期无论是从政治地位还是学术地位来说,周敦颐似乎均不能与上述学者相提并论。但是,在宋学集大成者朱熹、张栻所列的道统授受系列中,他却成为上接千年断绝的孔孟道统的宋学祖师,成为《宋史》中第一位列入《道学传》的北宋学者,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不少学者提出,周敦颐学术地位的提高,是朱熹、张栻推崇的结果,特别是由于朱熹在宋学中的重要地位,他对周敦颐之学高度赞扬和评价,从而确立了其在宋学乃至道统史上的历史地位。应该说,将周敦颐学术地位的确立仅仅归之于后来学人的推崇,并不能完全解释周敦颐之学为什么能上升到这么高的学术地位,因为朱熹本来就是一位思维严谨、知识容量很大的学者,如果周敦颐之学没有真正具有被推崇的价值,不可能这样高度推崇。因此,我们认为需要从宋学的问题意识出发,即宋学的崛起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而周敦颐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究竟是做了什么? 只有由此出发,才有可能阐释周敦颐成为"道学宗主"的根本原因。

关于宋代复兴儒学运动或宋学兴起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作为一种重新诠释儒家经典、阐发义理的新兴学术思潮,其最核心的问题意识,简单说,就是要解决儒家人文价值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究竟怎样才能在名教安身立命"[1]155的问题。自西汉"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全面影响并渗透到国家法典、社会制度、家族生活、学校教育各个领域,但是,在关于个体安身立命等涉及终极关怀的精神领域,以章句训诂或天人比附为特征的汉唐儒学却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所以这个时期盛行的佛道两教很快填补了这个空间,成为帝王官吏、文人学子、民间社会中精神领域的主宰。这时流行的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表明儒学中人道与天道、内圣与外王早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宋儒要在有关信仰的精神领域战胜佛道宗教,就必须建构出一种新的儒学形态,即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将已经分裂的治世与治心、人道与天道、外王与内圣贯通起来。所以,北宋初期的

收稿日期: 2006-04-20
作者简介: 朱汉民(1954—),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研究方向:宋明理学史。

儒学复兴运动,出现了一个重新注经的热潮,就是起因于这种统一天人之道的冲动和努力。[2]

在宋代经学中,《周易》受到宋儒最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其原因自然与宋学的上述问题意识息息相关。儒家经典中,确实只有《周易》对形而上之道表达了最强烈的关怀,并留下了最多可供建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所以,在宋代儒家学者群体中,《易》学成为重新建构儒家天人合一之道并重新确立儒家人文信仰的最重要学问。周敦颐的两部主要著作《太极图说》、《通书》均是《易》学著作,根据潘兴嗣所撰墓志铭记载,《太极图说》又名《太极图·易说》,《通书》亦名《易通》,可见它们均是讨论、阐发《周易》大义的《易》学著作。其实,北宋儒家学者普遍关注《周易》,胡瑗、石介、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宋学学者均留下了重要的《易》学著作。但是,为什么只有周敦颐的《易》学才成为道学的正统,只有他才成为上承孔孟道统的核心人物呢?我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易》学在确立儒家伦理价值的终极信仰,即所谓在名教中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上作出的十分重大的开创性贡献。

《周易》分"经"、"传"两部分。"经"由卦象及卦爻辞组成,它实际上是文王、周公时代占卜吉凶的卜筮之书;"传"由《十翼》组成,是儒家学派通过对"经"的解说发挥而建立的具有理性精神的学术体系。尽管《周易》的经、传在思想深度、理性程度上有着极大的差别,但它们在有一点上又是十分一致的,就是通过探索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寻求解决生活实践中的吉凶、得失等现实利害关系问题。《易经》的内容是通过向神灵卜问的方式为人们解决行动的吉凶问题,而《易传》则只是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探讨导致吉凶或得失的客观普遍性法则。所以,尽管《周易》中包含着大量的"道"、"天道"、"天"的概念,但与《四书》中以"忠恕"、"仁义"等道德规范言"道"不一样,它们主要体现为一种超越于个体存在之上并且能够决定人的吉凶、福祸、得失的普遍必然性或主宰力量。正如《周易·系辞上传》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这就是说,《周易》之道所表达的是天地、万物、精气、鬼神的法则、轨迹,所以它能够决定、主宰人们的吉凶祸福。《周易》所表现的正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精神,它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就是总结、发现行为的吉凶、祸福、得失的规律,即所谓的"极深研几"。既然《周易》的"经"是通过卜筮而预测吉凶,而"传"则是通过思考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而探寻得失,那么,"崇尚知"就成为《周易》哲学的一大特点。[3]100后来注疏《周易》的著作汗牛充栋,但研究者们似乎都继承了《易传》这种通过"极深研几"而探索天下事物规律,以获得对行为的吉凶、祸福、得失之预测的实用理性精神。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两部著作当然也继承了《周易》这种思考天地自然法则以探测吉凶得失的实用理性精神。他的关于"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化生"的宇宙论图式,关于阴阳变合、五行各一其性的法则,均是《周易》"极深研几"式的实用理性的体现。他特别继承了汉代《易》学,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筮占程式发展为太极生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尤有特色的是,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是一体的:既可以顺而下推,即从"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化生"的过程来看是一种宇宙生成论;又可以逆而上溯,即通过"五行阴阳,阴阳太极"(或"五珠二实,二本则一")的过程来追溯事物的宇宙本体根源。这样,宇宙生成论本身包含着本体论,本体亦存在于宇宙过程之中。周敦颐这种以《周易》为依据来建构宇宙生成论的哲学,应该说其创新方面并不突出,因为汉唐的《易》学、尤其是许多道家学者对此过程已有论述。显然,周敦颐的成就主要不是在此。周敦颐作为一个宋代儒家学者,他不仅对此宇宙发生论过程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而且将其作为儒家仁义道德的理论依据,使得宇宙起源、天地法则的自然哲学和儒家伦理的准则、境界、修养方法统一起来,这样就将儒家道德与终极关怀、名教与安身立命结合起来了,这才是周敦颐的成功之处。特别是他将这种学术创新与经典诠释结合起来,从经学的角度而言,是将《周易》的宇宙论与《中庸》、《论语》、《大学》、《孟子》中的政治、伦理思想结合起

来。他的《太极图说》、《通书》虽然都是《易》学著作，但是其中包含的大量伦理、政治的思想观念均来自于《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

下面，我们就来进一步分析探讨周敦颐是如何将《易》学与《中庸》、《论语》、《大学》、《孟子》结合起来，从而在名教中安身立命、确立儒家道德的终极依据。这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看。

一、《周易》的"太极阴阳"与《中庸》的"圣人之本"

由于汉唐儒学重视人伦而不及于天道，佛道宗教追求天道而舍弃人伦，宋儒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周敦颐通过《周易》而建立宇宙论，其目的是将其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终极依据。他在《通书》第一章就确立了这一重要观念：

>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4]
>
>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4]

周敦颐在这里将《周易》的宇宙论与《中庸》、《孟子》的伦理学非常巧妙地联结在一起：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一阴一阳之谓道"、"元亨利贞"等等，均是《周易》对天地万物的起源、规律的思考，表达的是一种宇宙变化的天道观；所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等等，则是《中庸》、《孟子》对儒家道德人格、规范的思考，体现的是社会道德的人道观。而周敦颐将二者结合起来，人道自之于天道，天道呈显于人道。这时，世俗生活的"五常"、"百行"的道德伦常，均具有宇宙根源的"乾元"、"乾道"、"天道"的永恒意义。

二、《周易》的"天地合德"与《论语》的"孔颜乐处"

宋儒所建立的天道与人道合一，不仅是宇宙论哲学，即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证明天道即人道；它也是一种人生哲学，所建立的是一种人道与天道合一的精神境界。在《周易》哲学中，"圣人"是一种领悟天道并能达到天人合一之化境的圣哲人格，当然，这种天人一体的人格精神更主要表现为把握天地万物规律的最高智慧。《周易·说卦传》中说"昔者圣人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圣人是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最高智慧，他的立法也就是天地自然的"性命之理"。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也描述过这种相似的最高精神境界，但这种境界是与圣人的"中正仁义"的"立人极"结合在一起的，故而才有所谓"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这样，周敦颐以道德型最高境界取代了以前的智慧型最高境界，他认为圣人是通过"中正仁义"、"立人极"的道德境界实现天人合一，这就完成了由先秦汉唐《周易》哲学向宋学型《周易》哲学的转型。

更有意义的是，他又将《论语》中的"颜子之乐"的伦理境界，提升到上述"希天"、"诚、神、几"、"廓之配天地"的天人合一之境。《论语》中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记载，这本是一种超越富贵贫贱的道德境界。周敦颐则将这种道德境界提升到与天道合一的宇宙境界，将"孔颜乐处"上升到终极关怀高度的天地之境。他在解释颜回为何"乐乎贫者"时说："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5]这个"见其大"不完全是见仁义道德之大，即如孟子在鱼与熊掌、生与义之选择时所强调的仁义之重要，更是见"天道"、"天德"、"太极"之大，是人与宇宙本源合一时而能达到的天地之境，即周敦颐在《通书》中反复说的："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6]"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7]这样，《论语》重"孔颜乐处"的道德境界就能够"与天地参而四时同"的天地境界统一起来，同时也获得了《周易》宇宙论哲学所提供的终极实在的依据。

三、《周易》的"吉凶之几"与《通书》的"善恶之几"

《周易》本是通过探索自然人事的变化规律而预测吉凶,尤重视在事物千变万化中迅速把握吉凶的征兆。《易传·系辞下》将这种事物变化开始出现端倪时称为"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也。"韩康伯注曰:"几者出无入有,理而无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者。……吉凶之彰,始于微兆,故为吉之先见也。"[8]要预测一件事情的吉凶,首先就必须尽快掌握"出无入有"的"微兆",因此,《周易》总是将深入思考而把握"几"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即所谓:"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9]圣人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人,能够在事物变化的萌发状态时把握其吉凶的可能趋势。

周敦颐的《易》学中,"几"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继承了《周易》中"几"所代表的隐而未显、始于动之微的状态,但是,"几"的内涵也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通书》中这样论述"几":

> 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10]
>
>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始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11]

尽管周敦颐仍是将"知几"作为圣人的重要特征,但是,这个"几"已经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其一,《易传》的"几"是外在客观事物的"动之微",而《通书》的"几"则成了内在心理念虑的"动之微",它们分别是"事动"与"心动"的重大区别;其二,《易传》中"几"的"动之微",体现了圣人对外在事物的吉凶结果的预见与把握,而《通书》中"几"的"动之微",体现了圣人对内在心灵的"善恶"动机的把握。因此,虽然周敦颐仍引用《周易》"知几,其神乎",但他的"知几"所表达的不是《周易》那种在事物的变化中把握吉凶的征兆,不是那种思考外在事物的自然哲学,而是在个体心灵的念虑中省察自己的善恶念头,这是一种表达内在心灵的人格哲学。这种转变,恰恰体现了宋儒对内圣之学发展的需要。

四、《周易》的知性智慧与《通书》的德性修养

《周易》是一部体现中国传统知性智慧的书,《易传》充满着对宇宙无穷奥秘的深入思考,体现出对天地曲折变化的观察预测,包含着对万物运动法则的理性把握,显示了通天、通地、通人、通鬼神、通昼夜的智慧光芒,以及对开物成务的无比自信。请看《易传》对知性智慧的崇尚和自信:

>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9]
>
> 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9]

由此可见,《周易》所崇尚的知性智慧,是一种能够"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的理性认知与实践开拓。尽管《易传》的"圣人"在充满理性智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某些德性观念,但这种德性观念最终亦纳入到"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的智慧型知性目标和预测吉凶的认知理性之中,那种"崇德广业"、"盛德大业"的德性内容,最终只是为了实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外在开拓。这种圣王气势确实与周敦颐《易》学的圣贤气象有很大区别。

如果说《易传》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知性智慧的弘扬而走向外在开拓的话,周敦颐的《易》学则汲收了思孟学派、佛道宗教的德性修养而走向内向收敛,他主张通过内向工夫而走向内在超越,从而确立终极信仰。这里列举他的修身工夫论来作进一步阐述。其一,"主静"。周敦颐把"主静"的德性修养置于"立人极"的地位。他在《太极图说》中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他的主静工夫源于宇宙本体的"静",即《通书》所谓"诚无为"、"寂然不动者,诚也"。显然这种"主静"工夫不同于主知的外向智慧,而是内在心理欲

望的克制，周敦颐对“主静”解释说“无欲故静”，这种“无欲”的工夫更是明显来自于道、佛两家学说，《道德经》、《庄子》以及佛学典籍中有大量“无欲”之说，而儒家典籍向无此说。其二，立诚。周敦颐以“诚”与“乾道”、“太极”相连而使其本体化，但他同时强调“立诚”亦是一种修身工夫。虽然《易传》、《中庸》中早有种种“立诚”之说，但周敦颐对“立诚”的解说，亦在强调其作为内向修身工夫的特征。《通书·家人睽复无妄》说：“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周易》本有《复》与《无妄》两卦，无论是汉代《易》学或王弼的《易》学，他们均是从卦象及其动静来作诠释，立足于万物的阴阳、动静的客观法则。而周敦颐则以“立诚”的工夫作诠释，具体而言，就是以人的内在善恶动机来解释“无妄”，鲜明体现出宋儒重视道德修身的内向工夫的特点。其三，“慎动”。《周易》认为外在事物处在变化莫测的状态，人的行动随时会有吉凶祸福的不同结果，故而提出“慎动”的主张，即所谓“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但周敦颐的“慎动”完全是一种道德修养工夫，《通书·慎动》说：“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矣。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他这里强调的“慎动”不是出于对吉凶祸福的不同后果的考虑，而首先是对“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德的服从，而这个五常之德恰恰又是来自于“诚”，来自于“乾道”、“太极”的最高宇宙法则。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主静”、“立诚”、“慎动”的道德修身工夫，一方面受《中庸》、《孟子》等思孟学派的影响，具有儒家的反省内求修身工夫的特点；另一方面，它亦受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通过内向的修身工夫实现精神的超越，亦表达出那种终极关怀式的宗教情怀。

参考文献：

[1] 余敦康.内圣外王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M].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

[2] 姜广辉.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J]. 湖南大学学报，2004(5)：3－12.

[3] 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

[4] 周敦颐.周元公集·通书·诚上第一[M]. 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5] 周敦颐.周元公集·通书·诚上第二[M]. 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6] 周敦颐.周元公集·通书·颜子第二十三[M]. 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7] 周敦颐.周元公集·通书·富贵第三十三[M]. 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8] 周敦颐.周元公集·通书·孔子下第三十九[M]. 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9] 阮元.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李鼎祚.周易集解[M]. 北京：中国书店，1980.

[11] 周敦颐.《通书·诚几德第三章》[M]. 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

The Spirit of Song-Dynasty Study in Zhou Dunyi's "Yi" Study

ZHU Han-min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Zhou Dunyi and his "Yi" study in the North-Song period did not show a remarkable status. However, he was regarded as the "orthodox master of Daoism" in Song-Dynasty stud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result was not completely due to the recommendation of Zhu Xi and other people, but due to Zhou Dunyi's consciousness in grasping the key issue of surviving in society. Based on Zhou Yi's universe philosophy, he built the Confucianist ethics recommended by the four books, and successfully converted Zhou Yi's Taiji wisdom of foretelling good and ill luck to moral nourishment of identifying good and evil. His work reconstructed a philosophy of ethics orientation.

Key words: Zhou Dunyi's "Yi" Study; the four books in Song-Dynasty study

(责任编辑　廖志敏)